

# 握有监督权的纪检干部 更要接受监督

刘武俊

央视1月3日开播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先后播放了魏健、罗凯、朱明国、钟世坚等严重违法违纪的纪检监察干部现身说法的镜头。一批昔日的“打虎干将”，如今却成为警示他人的“反面教材”，深刻说明纪委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干部也并非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没有监督的信任就等于放任。十八届中央纪委在媒体自揭“家丑”，毫不讳疾忌医，彰显了解决“灯下黑”的底气，以及用自我净化、自我革命的实际行动回答“谁来监督纪委”之问的自信。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是极其危险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处分7200余人，表明纪检监察队伍当中确实存在“灯下黑”，自我监督的任务还很艰巨。为了保持这支队伍的高度纯洁，必须毫不手软地查处违纪违法的纪检干部。王岐山同志在部分省(区)纪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纪委

要以身作则，把监督执纪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纪检干部是维护党的纪律的中坚力量，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中流砥柱。党章赋予纪委神圣职责和权威，打铁还需自身硬，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近些年来，纪委系统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战功卓著”，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和好评。党和人民越是寄予厚望，纪检干部就越要强化对自身的监督。纪检干部是监督党员干部的干部，正人理应先正己，以身作则，主动接受监督，坚决防止“灯下黑”。把监督执纪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为纪检干部拉上制度的高压电网。纪委最大的权力、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无疑就是监督执纪权，有必要进一步严格审查工作程序和业务流程，完善请示报告、回避等制度，把依规依纪审查审查的要求贯穿始终，实施全方位全过程监督。线索处置是纪律审查的源头，必须规范管理、依规处置，决不允许私自留存、处理涉案资料。对扣押、没收的款物要有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不定期开展抽查。

纪检干部联系同一个部门或地方时间长了，监督往往抹不开面子，有必要实行定期轮岗，及时给纪检干部换换地方。通过细化措施，把对纪检干部的监督一圈一圈地拧紧。把监督执纪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坚决对纪委系统私下说情、打探案情等干预办案的现象说不，建立登记备案通报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惩纪委系统的“内鬼”，决不姑息迁就。十八大后，中央纪委内部查处了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和中央纪委原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等“跑风漏气”、通风报信的“内鬼”，极大地提高了纪委的公信力。把监督执纪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进一步推进纪委的“去神秘化”和阳光办案，让监督执纪权大大方方地接受群众监督。诚如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所言：中央纪委不是一个神秘的机关，或者说不应该是一个神秘的机关。机构的神秘归根到底源自权力的神秘，既然权力应当在阳光下运行，那么纪委的监督执纪权自然也应该在阳光下运行，让群众看看究竟是哪些纪委

# “大师”的启示： 你之前学的可能都是错的

舒圣祥

1月4日下午，神秘账号“Master”(“大师”)继续在网上挑战人类顶尖围棋高手，第54局，棋圣聂卫平出战。结果毫无悬念，棋圣输了。而在此之前，“Master”已经连赢53局，仅仅因为人类棋手断网，被机器判过一次和棋。

棋手群体已经基本否定了“大师”是人类棋士的可能，剩下的悬念，只有“他”到底是不是去年初战胜李世石的“阿尔法狗”。经此连续PK，人类顶尖棋手基本已全军覆没。

围棋成为人工智能攻克下的第一个人类高端智能领域。如果人的领域，不比围棋更为复杂精深，你该为自己的饭碗感到忧虑，因为你没有任何机会干得过人工智能，无论你是律师还是医生，是专家还是“砖家”。

“大师”的棋招，每一手都很普通，但每一次都能赢棋。“大师”的一些下法，甚至有悖于专业棋手们从小学棋时接受的理论体系，“他”一直在告诉人类棋手：你们之前学的都是错的。这才是真实的世界：以人类的智力水平和历史经验，很多我们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在一个更大的智力尺度下，很可能都是错的。我们从小学的那些定理、那些公式、那些概念，在更高智力拥有者的眼里，也许只是两三岁孩子的水平。

想明白这一层，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恐惧感，好像真的啥也不懂了，什么也不会干了。但是，这样的理解是肤浅的，也是无益的。就好像很多人在忧虑人工智能会

取代人类，会让大多数白领失业，那并不是问题的症结。一方面，忧虑我们无法改变的事情，很无聊；另一方面，重要的永远不是别的，而是我们能干什么。

你们之前学的都是错的——“大师”告诉我们的这一点，应该让人类感到兴奋。因为我们老以为所有人类可以知道的知识、可以发现的真理，已经被前人捷足先登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对于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有哪些不知道的而已，就好像苹果手机出现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手机还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学的很可能是错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认知，不让自己囿于自己给自己或者别人给自己划定的边界里。如果不能持续学习，这个世界大概没有“不惑”与“知天命”这回事。否定自己，否定真理将成为常态，既然随心所欲那就不妨逾矩。

我们要承认，就像围棋业余选手与围棋职业高手之间存在着的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在知识的领域，普通人和智者之间也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山岚。正因为差距巨大而无可逾越，所以很多人安于智力上的愚昧和贫穷。但是现在，这些鸿沟正在填平，这些山岚正在崩塌，在人工智能所呈现的阔如大海的未知面前，每个人有机会乘着一艘小船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新大陆。

人工智能即将横扫一切，无知的人感到恐惧，理性的人感到兴奋。因为“你们之前学的都是错的”，即使看上去我们已经相差甚远，但其实仍是站在差不多的起跑线上，未来的世界里，机会属于乐观而努力的人。

# 判处『摆射击摊案』应体现谦抑原则

魏文彪

因所摆射击摊上的6支枪形物被鉴定为枪支，天津市51岁大妈赵春华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1月3日，赵春华在看守所表示，不服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北区人民法院已受理了赵春华的上诉状(1月4日《新京报》)。

按照《公安机关涉案枪支弹药性能鉴定工作规定》，对不能发射制式子弹的非制式枪支，当所发射子弹的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1.8焦耳/平方厘米时，一律认定为枪支。而相关军事专家称，这一标准的枪形物打到人身上，皮肤不会有破损性伤害，只有打到眼球上才会有伤害。其认为，目前规定的枪支鉴定标准较低，模糊了大威力玩具枪和真枪的界限，基本上枪状物体可以被鉴定为枪，所以有修改的必要。

而赵春华表示，她在案发前根本不知道利用相关枪形物摆射击摊涉嫌犯罪，“如果提前告诉我一声，我肯定不摆了”。其代理律师提交的“刑事上诉状”也提出，“上诉人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上诉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据介绍，赵春华来自内蒙古，此前在天津一直没有工作，去年8月份刚以2000多元的价格从别人手中接过气枪射击摊，这是她的唯一营生。经营两个月，她每个月能获得2000多元的收入。而在大城市，像赵春华这样的情况，无疑属于生活困难人员。

应该承认，目前相关法院对赵春华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过，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基于各种原因，有必要在执法时体现谦抑与自我克制。在当前枪击判断标准被认为较低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对相关法规规定与标准不熟悉的生活困难人员，仅仅因为其利用6支枪形物摆射击摊，便对其处以严厉的刑罚，无疑没有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其实，正如相关法律工作者所指出的，对于赵春华一案，完全可以在法律范畴内，以警告教育、行政处罚等方式予以惩戒，而不必“剑走极端”，让当事人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如此，就能以最轻的处罚获得最大的效果。反之，对赵春华这样社会危害较轻的案件动辄“刑天伺候”，虽然合法但不合理，并不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甚至会带来负面影响。

## 画里话外

据1月3日《法制日报》报道：每月5500元，这是北京市民李女士租住的房屋在2017年的价格。而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这套房子的租金是每月5000元。我国目前的租房市场仍不规范，“黑中介”、假房东、二房东重重设卡，“霸王条款”、无理涨价、房租欺诈、不退还押金等现象依然存在，租房者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障。

房租任性涨，北漂人彷徨。供需不平衡，市场多乱象。城市要发展，民生需保障。除了严监管，莫忘廉租房。

郑晓华 文 焦海洋 绘



# 政府出台“彩礼指导标准”值得商榷

付彪

2016年12月27日，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下发文件，对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6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这看上去如同行政审批。虽然“只是指导性的东西，并没有强制性”，而且“很多人颇为拥护”，但仍难以逃脱“管得太宽”的议论。

遏制高额彩礼之风，政府责无旁贷。不过，出台具体“指导标准”值得商榷。一则，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管控民间习俗；众所周知，结婚彩礼是我国古代相沿至今的一种民间习俗，是男方和女方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应该属于私事。而对于普通民众私域的干预，政府公

权力应慎之又慎。虽说文件只是“指导”，并无“强制”，但毕竟缺乏法律依据。如此行政干预效果恐难尽如人意，甚至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再者，对于农村高额彩礼陋习，除了行政干预，有没有更好对策？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探索了一些做法。比如，要求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上带好头，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用实际行动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带动“民风”转变；引导村民成立自治组织，细化完善“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逐渐摒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

事实上，移风易俗有一个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味地“禁”和“罚”，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然而，政府发行政命令，要求彩礼控制在6万元以内，喜宴宴席控制在10桌以内，车辆总数控制在6辆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这看上去如同行政审批。虽然“只是指导性的东西，并没有强制性”，而且“很多人颇为拥护”，但仍难以逃脱“管得太宽”的议论。

遏制高额彩礼之风，政府责无旁贷。不过，出台具体“指导标准”值得商榷。一则，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管控民间习俗；众所周知，结婚彩礼是我国古代相沿至今的一种民间习俗，是男方和女方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应该属于私事。而对于普通民众私域的干预，政府公

权力应慎之又慎。虽说文件只是“指导”，并无“强制”，但毕竟缺乏法律依据。如此行政干预效果恐难尽如人意，甚至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再者，对于农村高额彩礼陋习，除了行政干预，有没有更好对策？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探索了一些做法。比如，要求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上带好头，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用实际行动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带动“民风”转变；引导村民成立自治组织，细化完善“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逐渐摒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

事实上，移风易俗有一个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味地“禁”和“罚”，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新华社记者 董建国

连日来，互联网上春运抢票大战已进入冲刺阶段。面对这样的“技术活”，作为春运主力军的农民工却有一种“无力感”。当网络购票模式渐成主流之时，让农民工不再“输在起跑线”上显得尤为迫切。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数据显示，自12月15日发售2017年春运第一天车票起，截至12月29

## 热点 @微评

本期主持：朱晨凯

据1月4日《齐鲁晚报》报道：元旦假期，76岁的陈庆兰、80岁的王强和72岁的李秀珠三位留守老人，带着三幅历时四十多天用自己白发绣成的“家书”现身苏州山塘街。三位老人希望自己在外打工的女儿能回家与他们团圆。



点评：多少根白发才能绣成一封家书？这背后的心酸，渴望唤醒的是子女的孝心。“白发家书”能吸引眼球自然是件好事，但所有人应反思，如何才能让望穿双目的父母少一些思念之苦？@我炒鸡炒鸡帅a：可怜天下父母心啊。@王倩小六六：这样的“作秀”，是正能量的。



据1月4日《现代快报》报道：1月2日晚8时多，家住南京的陆女士报警，原因是楼下邻居用“震楼神器”制造噪音，害得他们一家人没法睡觉。“震楼神器”是一种小型震动机器，不少人买回去就是为了对付楼上(下)的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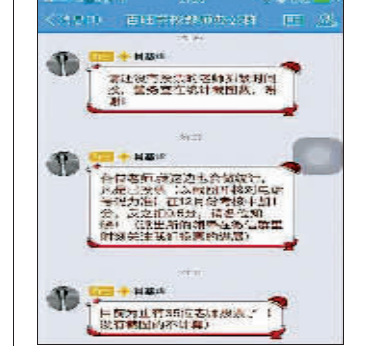
点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制造噪音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警方可以对其进行治安处罚。还是别图一时痛快，触犯了法律。花钱买“神器”的这点小脑筋，不如放在处理纠纷和增加沟通上。@大沫沫：归根到底缺乏沟通。@阿尔法狗狗：“以暴制暴”是没有赢家的。

据1月4日中青网报道：1月2日，南京市举行教师招聘，英语考试有55分的考题和2016年江苏几家名校高考模拟题完全一样，连答案顺序也没变，考生们质疑很多人做过原题，不公平。南京市教育局回应，试卷是由教育局从题库中抽取的，目前正在调查中。



点评：试卷是随机抽取的，谁也无法预知结果，过程本身对大家很公平。在公平的前提下，即使以前有少部分人做过模拟题，也应认可这种小概率事件。再说，考试不就是检验学过的知识吗？@星星：考过的再考，也不错，强化一下。@喵喵薯826：应该更新一下题库了。

据1月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在评选“深圳最美政法干警”活动中，深圳一所学校强制老师选择所属区里一位候选人，并与老师绩效考核挂钩。当地政法委表示，不会强制要求学校投票。



点评：当地政法委及时“撇清关系”，称不会强制学校投票。但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是学校“闲得慌”，愿意顶着老师们的反感搞强制投票，还是怕得罪什么人而不得不为？应该好好查查，这强制投票的“驱动力”到底在哪。@克拉码头：这样投出来的结果，有什么意义？@奔腾吧1997：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和绩效考核挂钩，这才是问题所在。

日，互联网售票量占总售票量的比例超过7成，移动售票已经成为广大旅客首选购票渠道。然而，网络购票对农民工而言还是一道门槛。要有网络连接环境，要有手机、电脑等设备，要有网银、微信、支付宝等支付方式。在这种形式下，那些不会网络操作、不懂网络支付的农民工只能望“网”兴叹。即便一些农民工好不容易学会上网购票，花样百出的抢票软件也让他们接不暇，有人感叹抢火车票犹如中彩票。应当看到，近年来为了解决农民工购票难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和各地作出了不少努力，如开设农民工购票绿色通道、提前办

理务工人员团体票、开设农民工专列等。但是也要看到，互联网时代网络购票是大势所趋，新型农民工的年龄知识等结构在发生变化，解决农民工购票难的举措也应与时俱进。比如，有地方开展培训活动，从用户注册、选择车次和座位偏好、进入刷票到最后网络支付，“手把手”教农民工网购春运火车票，这样的帮扶之举就值得借鉴。网络购票，总体而言对广大旅客是方便的，但是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不能让他们排队。只要大家肯想办法多想办法，一点点克服困难，一定能让农民工的回家之路更多便捷、更多暖意。(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